学术专论

乾隆朝进呈讲义始末考

陈　东

［摘要］中国古代帝王教育主要有经筵、日讲及进呈讲义三种形式。清代乾隆时期进呈讲义长达十二年之久，直接涉及在朝大臣三百余人，对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及学术影响甚大。乾隆时期进呈讲义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与宋元以来历代进呈讲义不同，其目的不在帝王教育，而是更注重对大臣品性的考核与鉴别。《御览经史讲义》作为进呈讲义的汇编，残缺遗漏之处甚多。乾隆以后的嘉、道、咸、同乃至光、宣各个时期，对此次进呈讲义的评价不尽一致。

［关键词］乾隆　经筵　日讲　进呈讲义　御览经史讲义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0）－03－0066－09

Proposed Imperial Reading Materials in the Qianlong Period

The system for educating emperors was comprised of three main forms, official expositions of the classics, daily lectures, and proposed imperial reading material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posed imperial reading materials lasted for twelve years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and, with more than three hundreds officials involved, it cast a deep influence up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al, cultural and academic realm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purpose of the proposed imperial reading materials lies not only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emperors but also in the assess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officials. The content of these compilations also exhibited different features at different times. After the Qianlong reign *Imperial Reading Materials* (Yulan jingshi jiangyi) was fragmentary and contained many omissions.

中国古代经筵是一种帝王教育制度，形成于宋朝，为元、明、清历代所沿袭。其主要教学形式有三种，即经筵、日讲与讲义进呈。明、清时期狭义的“经筵”只是指帝王讲席的开学典礼；“日讲”则是指其每日正规功课；进呈讲义则把讲章直接递呈给帝王，由帝王在宫内自习阅读。清代乾隆年间的经筵每年分仲春、仲秋举行两次（乾隆中后期只有一次）。清代日讲早已在康熙时期废止，乾隆朝也未能恢复。因此，进呈讲义成为乾隆朝帝王教育仅存的一项主要内容。

乾隆朝进呈讲义从乾隆二年（1737）始至乾隆十四年（1749）止，前后持续达十二年。直接参与进呈讲义的翰林院、詹事府、各科给事中、各道监察御史在三百人以上，间接参与其事的大学士及各部堂官则不计其数。乾隆朝进呈讲义与历代讲义进呈多有不同，其帝王教育的意义不大，更重视的却是对朝臣品性的识别与考核。乾隆朝进呈讲义对乾隆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学术，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对考察乾隆初年乾隆帝学术及统治思想的转变，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10－01－10

［作者简介］陈东（1963—），男，曲阜师范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曲阜 273165

一、乾隆朝进呈讲义的背景及其起因

进呈讲义这种形式在宋代讲筵中已经出现。据说“往在庆历（1041—1048）之初，仁宗皇帝因臣僚上言请留意近代典故，遂诏儒臣检讨唐朝故事，日进五条。曾未期月，省阅迨遍”。①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也曾“诏侍读官，遇不开讲日，论具汉唐故事有益政体者二条进入，仍旬一录申三省”。②后来将诸臣所进汉唐故事编修成册，名为《迩英要览》。③南宋绍兴（1131—1162）年间也曾令“讲读官进讲义，从官进故事”。④

明朝时进呈讲义成为日讲的替代形式。明万历十九年（1591）二月十九日，文书房传圣谕“朕从去年十一月内圣母万寿节出朝后至今，目发红瘾，左膀酸痛，头目不时眩晕。经筵可暂免，讲章写了进来，庶朕朝夕省览。日讲讲章写了进来。”⑤由此导致了万历朝经筵的彻底停止。

清代经筵日讲始于顺治十二年（1655），经过康熙初年的短暂停顿后，一直坚持得很好。康熙二十五年（1686）闰四月初六日，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令翰林院将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俱交于张英（1637—1708），令其赍至内廷”。⑥这是清代最早的进呈讲义的记录。清雍正年间，恢复设立了“日讲起居注官”，但并没有恢复日讲，也不见有进呈讲义的记录。由此，清代帝王教育只剩下了仪式性的“经筵”，没有了真实性的内容。

乾隆二年（1737）三月，乾隆帝尚在三年丧期，经筵仪式尚未举行，兵科掌印给事中毕谊（1691—1755）奏进《请缮进经史以资圣治疏》。疏中论述说：自古圣贤之君靡不由学，人主“求治”与“向学”必须兼顾。虽然“社稷民人，何者非学，而圣德大业，咸备于书，如欲希美于圣神，固必借资于典籍，即思收效于广听，亦当参考于成编”。希望乾隆帝继续青宫时期刻苦学习的精神，勉力向学。毕谊建议“敕史臣取经史诸书及古来奏议，不论卷帙，亦勿拘忌讳，日派二人，缮写数幅，依时进呈”，以便圣学日进。⑦乾隆帝认为毕谊所奏非常有理，遂“令诸臣日缮经史奏议，理得施行。在朕广挹群言，可以因事鉴观，随时触发，而览诸臣所进，亦可考验其学识。或召见讲论，则性资心术，必因此可觇”。⑧

毕谊的建议中进呈讲义者的范围只限于“史臣”（即翰林院编修、检讨及日讲起居注官等职），乾隆帝则将其扩展到六科十三道诸臣。毕谊建议进呈讲义的主要目的在于便于“圣学”，即教育帝王。乾隆帝上谕所言进呈讲义的目的已经歧为两端：其一是广挹群言，因事鉴观，随时触发；其二是考验群臣学识，进而召见讲论，由此检验其性资心术，而重点又在于后者。

总理事务大臣等遵旨会议，并拟定了轮进讲义的具体办法：讲义范围局限于经传、诸史及奏议。《诗》《书》《易》《礼记》《周礼》等，择有关于“天德王道”者；《春秋》三传，择其“圣人定是非之难辨以植纲常”者；诸史内，择其“用人行政，实有关于治乱安危”者；奏议，择其“伉直剀切，寓目警心，济于实用”者。讲义要求在“臣谨按”之后附列所见，无所忌讳，逐日进呈，不拘条数。“凡所采录必具得要领，实有启沃，然后日力不费而裨益良多”。进呈班次为：翰林、詹事为一班，科道为一班。轮班进折，每日只用一人。周而复始。⑨值得注意的是，总理事务大臣等所拟轮进讲义的目的依然是在于“实有启沃”，也就是说重点还是在于对皇帝的启发教育。

乾隆二年（1737）三月二十七日，乾隆帝谕旨“依议每日缮进书折，朕披阅后交南书房收存。其或召见讲论，朕所降旨，令本人于次日缮写呈览，亦交南书房收存。将来行之日久，不特集思广益，亦可荟萃成书，以资观览。”⑩由此开始了长达十数年的经史讲义的进呈。

总的来看，在进呈讲义的目的与动机上，群臣与乾隆帝的想法并不相同。群臣意在借此代替日讲，开拓一条进言渠道，实现启沃君王，教育帝王的目的；乾隆帝则意在考鉴群臣学识与资性，其次才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希

望群臣对政治治理有比较好的建议。群臣意在教育帝王，乾隆帝意在考验群臣，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目的。

二、乾隆朝进呈讲义的阶段及其特点

根据乾隆帝的态度及进呈讲义的内容，乾隆时期进呈讲义可以将其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三个时期各有不同的特点。

乾隆二年（1737）三月至五年（1740）十月为进呈讲义的早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乾隆二年（1737）十二月上谕为指导原则，讲义内容注重援古鉴今，经世致用。

乾隆二年（1737）十二月戊戌，乾隆帝上谕内阁 “朕命翰林詹事诸臣录呈经史，本欲以明义理之指归，审设施之体要，所望切实敷陈，昌言不讳。如大易否泰剥复之几，尚书危微治忽之旨，风雅正变美刺之殊，春秋褒贬是非之实，与夫历朝史鉴兴衰理乱所由，人材之进退，民生之疾苦。鉴往古以儆无虞，善为法而恶为戒。庶披览之下，近之有助于正心诚意，推之有益于国是民生。涑水通鉴之编，西山衍义之辑，政治所资，前规具在。若有避讳之心，言得不言失，言治不言乱，则非所谓竭忱纳诲之道矣……诸臣各就意见所及，毋专取吉祥颂美之语。论理必极其周详，论事必极其切当。务裨实用，勿尚肤词。朕虚心采纳，于诸臣章奏尚屡降谕旨，令勿拘忌讳，况经传之旧文，载籍之往事，更复何所避忌。若以避忌为恭敬，是大谬古人献替之义，亦且不知朕兼听并观之虚懔矣。”[11]

乾隆帝此谕表示：不但希望群臣对天理治道、纲常义理等哲学理论问题有所认识，同时希望群臣畅言无讳，切实敷陈，摆出了一副听言纳谏的姿势。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篇上谕只说到“六经诸史”，对“四书”一字未提。这不太符合乾隆初年特别热衷于理学的情状。此外，这篇上谕对前此乾隆帝所言欲以鉴别群臣资性的意图也是只字未提，更多的是表达了群臣的意愿。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篇上谕可能不是乾隆帝真实意思的表露。

无论如何，乾隆二年（1737）上谕的精神在进呈讲义的早期得到了贯彻。早期进呈讲义的内容大多注重经世致用，在阐释经史古义的同时，结合现实政治，直抒己见，提出了不少改革与改良建议。

如乾隆四年（1739）三月，编修李锦在进呈讲义中谈到赈济流民的问题，请求于五城饭场再加赈两月，老弱妇女量给盘费使还故土，至疲癃残疾无处可归者，拨归养济院、栖流所。[12]同年四月，检讨张鹏翀（1688—1745）在进呈讲义中谈到清代养士制度，建议清查学校甚贫之士，以学田、学廛等量加赠给。[13]

同样是乾隆四年（1739）四月，修撰金德瑛（1701—1762）进呈讲义内建议改进清代科举制度。他认为制科二场设判语五条，以考其律令，存名失实，徒为具文，应该参酌变通，删去判语五条，改命二题，于律内择其同类，参差剖断不齐之处，每题征自变量条，俾士子推原其故，断以己见，谓之律解，列于试录同刊进呈，建议化骈语为散文。[14]大约同时，检讨叶一栋在进呈讲义内论及田租价格问题，说业户收佃户租米租银，常常自造租斛、租戥，加大佃户负担，建议立法禁止。[15]

十二月，编修李锦在进呈讲义内说到府州县学生员中贫富悬殊过大，建议对于生员中极贫、次贫者，在济贫旧额歉岁赈口外，酌量予以衣食之资，照国子监养士例，宽给廪资。同讲义内又涉及清代保甲制度，建议各省州县零星村庄户口，应一并附编邻近村庄保甲之内，不必拘泥十家之限。[16]同月，监察御史王兴吾在进呈讲义内涉及清代六部考课机制，认为六部司官应仿照周礼旧制，令各部堂官在每年封印前后，将各官所办事理之当否、奉职之勤惰，分为三等缮折进呈。[17]

也是在乾隆四年（1739）十二月前后，监察御史徐以升在进呈讲义内论及清代盐政，说到奸商大贾知盐为小民生活必需品，故而高其值以邀厚利，建议官府控制其价格。[18]大约同时，检讨张鹏翀在进呈讲义内建议：月朔、望视朝宜酌为定制，令翰詹科道分班递进，俾各得从容献纳。[19]

由上述可知，乾隆早期进呈讲义注重“资治”，侧重联系清代现实政治，基本做到了直言不讳。这一时期乾隆帝也表现出少有的

开明，对群臣讲义所奏虚心听纳，具体建议大都转交大学士或有关部院议覆。以下述夏之蓉（1698—1785）国子监改革建议等来看，进呈讲义早期乾隆帝的态度还是非常认真的。

乾隆五年（1740）九月，检讨夏之蓉在进呈讲义内建议国子监仿照宋朝胡瑗（993—1059）经义斋、治事斋取士办法，详明规制。属经义者，六经诸史或专通或兼通，分其差等，以时稽之，以月试之，以岁省之，合者留，不合者去；属治事者，田赋、兵法、刑律、礼制、历律等，各令自署所长，分条考核，期于贯穿古今，通达政体为主。果有德艺可观、拔萃出类之士，大司成列诸荐牍，以备擢用。诸不率教及不通一艺者，悉皆罢遣。[20]乾隆帝阅后将此讲义转大学士讨论。大学士等讨论后认为："夏之蓉所奏宋胡瑗苏湖教授之法，于太学养士之道原属有益，若果能敦崇实学，师法立而程课严，行之日久，则人材自多成就。"建议将此讲义转国子监祭酒讨论具体实施，乾隆帝表示同意。[21]同年十月十二日，大学士赵国麟及国子监祭酒等回奏说：检讨夏之蓉所奏，与前管国子监事孙嘉淦（1683—1753）所奏相同，业已谕准举行，夏之蓉所奏"毋庸再议"。乾隆帝最后批示："成均课士之道，惟贵躬行实践，不在多立科条。大学士赵国麟等所奏经义治事诸款，皆从前孙嘉淦所奏准者，若果实力奉行，自能成才育德，有裨学校。如徒视为具文，虽再增条款，又复何补。"最终放弃了夏之蓉的改革建议。[22]

有材料证明，即使在进呈讲义的中期，乾隆帝对讲义所涉及的建议也是非常重视的。乾隆八年（1743）四月，监察御史徐以升所进讲义折内请行区田之法。乾隆帝将此讲义交大学士讨论。大学士们讨论后认为："查区田一亩，约费工本银三两，虽不能如古六十石、三十石之数，大约每亩必可得十余石。收获之广，无逾此者。再查区田之法，本以备旱，北地尤宜。应令北省督抚饬地方官，暂租地亩，按法施行。"[23]乾隆帝批示："此折不必交与督抚。着交与奉宸苑（内务府所属三院之一，掌皇室苑囿园林），令其依法试种。"最终结果如何，有待查考，但毕竟是进入到了实验推广阶段。

当然，进呈讲义中有关建议最终结果似乎并不太尽如人心意。有关部院多以"毋庸议"予以拒绝，或者以"意非不善，事属难行"予以推脱，真正得到施行的建议并不多。对此，翰詹科道官员意见非常大。乾隆四年（1739）八月十二日，御史张湄上奏指责大学士及有关部院"凡奉旨交议事件，并不平心和气斟酌可否，总以'毋庸议'三字驳倒为快，甚且极口丑诋，胜于怒骂，意欲箝小臣之口"。[24]御史陶正靖（1682—1745）在进呈讲义中也抱怨说："今日在廷之意指，盖包含之意居多。其见诸施为者，则似乎宽裕而实纵弛，似乎详密而无关体要。至乐因循而惮改变，则尤为切中。且如群臣条奏下部议者，其说在可否之间，行之固属无益，不行亦复无害，而一纸空文，可以塞责，则姑议行之，以称皇上求言之心，以示不拒人言之意。其他则以为难行而置之者有矣。"陶正靖认为事当论是非，不当论难易。苟是矣，虽难而当行。若其非也，虽易而必不可行。[25]

早期进呈讲义中的诸多建议没能付诸实施原因很多，有执行机关因循守旧无意改革的因素，也与翰詹科道所提建议与时事不尽切合有关。翰詹科道官员大多初涉朝政，热情有余，经验不足，所提建议理想成份多，可行性不足。但是，早期进呈讲义能得到乾隆帝及当朝大学士的重视，进呈讲义人员基本能够畅所欲言，这还是难能可贵的。

早期进呈讲义除重视经世致用外，还非常重视文采。这与乾隆帝的喜爱与鼓励密切相关。乾隆三年（1738）九月上谕："编修彭树葵奏进经史讲义，引用魏征十思疏内之语，以为人君之德在于慎思，且衍十思之意为箴十首，词亦典雅，尚近古人箴规之意，与泛论经史者不同，甚属可嘉。着赏内用缎二匹、笔墨二种，以示优奖。"[26]乾隆四年（1739）二月上谕："轮进经史讲义之程盛修所进咏史乐府十二章，指事寓规，词意婉挚，得献纳之意，与泛论经史者不同，甚属可嘉。着赏内用缎二匹、笔墨二种，以示嘉奖。"[27]无论是十思之箴，还是咏史乐府十二章，文体与格式都在讲义进呈规定的范围之外，但却受到了乾隆帝的表彰与赞赏。由此，讲义中出现了夹杂颂、

赞、箴、铭甚至四言诗歌的特殊体裁，有些讲义的字数也超过了千字左右的约定。

乾隆五年（1740）十月至乾隆九年（1744）九月为乾隆朝进呈讲义的中期。中期讲义以乾隆五年（1740）十月十二日上谕为指导思想，特点是注重理学义理的探讨，注重君道、治道等理论性总结。

乾隆五年（1740）十月十二日，乾隆帝谕内阁："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原欲探圣贤之精蕴，为致治宁人之本。道统学术无所不该，亦无往不贯。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盖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朕愿诸臣研精宋儒之书，以上溯六经之阃奥，涵泳从容，优游渐渍。知为灼知，得为实得。明体达用，以为启沃之资。治心修身，以端教化之本。将国家收端人正士之用，而儒先性命道德之旨，有功于世道人心者，显著于家国天下。朕于诸臣有厚望焉。"[28]

乾隆帝此谕希望群臣在重视经学训诂的同时，更多地把注意力转移到理学上来。正是由于乾隆帝的刻意提倡，中期进呈讲义在经、史、奏议之外，又增加了"性理"的内容。后来汇编的《御览经史讲义》共31卷，收入讲义716篇，其中有关"性理"的内容单独为一卷，收录讲义17篇。

此外，中期以后，关于天道心性等哲学思辨、治道君臣等政体理论问题的讲义内容明显增多。《御览经史讲义》卷首所收讲义15篇，大多都是理论性的，都得到了乾隆帝的召见面谕，足见乾隆帝对理性思辨类讲义的重视与欣赏。

进呈讲义有召见进对的规定。乾隆帝对阅读后感兴趣的讲义，会召见进呈人员，当面讨论。《御览经史讲义·诸臣进讲钦奉上谕》就是有关记录的汇集，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帝对哲理性、抽象性理论问题抱有很大的兴趣。此时，乾隆帝尚醉心于程朱理学，对群臣讲义的评论大多是以程朱理学为标准。如在阅读过检讨孙景烈（1706—1782）《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节讲义后，乾隆帝阐述"天德、乾元"的关系说："尔所进讲不合朱子本义。朱子云：乾元天德之大始，又为四德之首，而贯乎天德之始终，故曰统天。此说最精。尔讲云：天虽总统万物，而乾元乃所以总统天。是添出天统物一层，将天与乾看成两样了。"[29]

当然，乾隆帝对朱子也不是盲从。在有关文字的训诂解释上，乾隆帝有时也会另立异议，发表一些不同于朱子的见解。如在评论监察御史丛洞（1687—?）《诗经》"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节讲义时，乾隆帝不同意朱子释"爱"为"媚"，而认为应该释为"顺"："尔所进经义，遵照朱子之说，君能纲纪四方，而臣下赖之以安，则百辟卿士媚而爱之，维欲其不解于位，而为民所安息也。但以爱言媚，不足以履臣道之实，而补出维欲其三字，以不解于位专属于君，亦无以见君臣各尽之义。以朕看来，媚不得以爱言，当作顺字看。不解于位，不专指君，亦兼臣说。盖谓君能尽道于纲纪以安其臣，臣顺天子之休命，以尽其职……"[30]

乾隆帝对理学的兴趣并没有持续多久。乾隆八、九年间，乾隆帝对理学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乾隆八年（1743）二月，乾隆帝颁布谕旨令各省学臣以朱子所辑《小学》命题，考试士子。[31]乾隆九年（1744）八月，编修杨开鼎在进呈讲义中竟然建议"学以敦行为主，尤以明经为要"，奏请国子监及各府州县学着重以经学造士，主张学臣考校生童务必以经义与四书文并重。乾隆阅后交大学士等讨论。大学士的意见是："查六经为载道之书，国家设科取士，自州县试以至乡会，近奉谕旨，训饬考官，不得专重四书文而忽经义。"[32]乾隆帝批准了有关奏请。由此可见，乾隆帝此时已经有了转重经义的念头，杨开鼎的讲义则进一步促成了乾隆帝有关思想的转变。

进呈讲义中后期，乾隆帝逐渐对理学失去了兴趣，对讲义中进献诗赋失去了兴趣，对讲义借古讽今、议论时政也失去了耐心。乾隆七年（1742）十二月，翰林侍讲学士周长发（1696—1761）因讲义中夹杂谀词，受到乾隆帝的训斥，贬官两级。乾隆上谕说："朕令翰林科道轮进经史讲解，原以阐发经义，考订史学也。而年来诸臣所进，往往借经史以牵引时

事，或进献诗赋，与经史本题无涉，甚失朕降旨本意……周长发着严饬行，并将此旨传谕翰林科道等知之。”[33]禁止讲义中“进献诗赋”情有可原，但如果因此而一概禁止“牵引时事”，则与前此要求“务裨实用”、奖励箴铭乐府谕旨等，完全是判若两人。乾隆九年（1744）九月，编修黄明懿在进呈讲义中为北闱科场弊案辩护，惹怒乾隆帝，遭到褫职处分。从此乾隆朝讲义进呈进入末期。

乾隆九年（1744）九月至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为乾隆朝进呈讲义的后期。此一时期，进呈讲义内容固定化、格式化，仅仅局限于枯燥的义理阐发。乾隆帝失去了早期“竭忱纳诲”的态度，进呈讲义如论及时事被指为“藉端立说，以逞私见”，进献诗赋被指为“专事浮华”，群臣进言动辄得咎。讲义进呈成为群臣厌弃的负担。

自乾隆九年（1744）九月黄明懿案后，乾隆帝开始严禁进呈讲义涉及时政。乾隆帝发布上谕说 “朕令翰林科道轮进讲章者，原以讲明义理，裨益学问也。若臣工有欲行陈奏之事，自应明白直陈于君上之前。何得借讲书之名，以巧用其术……黄明懿身为翰林，若欲建白谏诤，即当据实敷陈。今乃借进讲经书，隐讽时事，甚属奸险诈伪者。着交部严察议处。”[34]进呈讲义涉及时事竟然被扣上了“奸险诈伪”的帽子，后果非常严重。

乾隆十一年（1746）十月，乾隆帝再次颁布上谕 “朕命翰林科道官轮日进讲经史，本欲讲究经术，阐明义理，以淑身心，以鉴兴废，而诸臣讲论往往滥入条陈，若实有裨政务则亦何害，要不当藉端立说，以逞私见也。即朕回銮后数日，如检讨程恂，举程子 ‘一命之士苟留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一条，因请重县尉之选，欲以士人初任是官。是一县又增一令也，成何政体？今日御史冯秉仁进讲‘因名山升中于天’一句，折中印 ‘宋祥符中有事泰山，往还四十七日未遇雨雪’等语。其意盖因朕昨登北台，气候晴暖，曾宣示在京大臣，故为此影射之词，且预拟朕今年巡幸山西，将来当有东巡之事，故为此奏耳。”[35]俨然已经动用了文字狱的伎俩。

乾隆朝进呈讲义的早期，上谕要求各抒己见，毋所忌讳；后期则是严禁“滥入条陈”，不然就是“藉端立说，以逞私见”。早期乾隆帝违规采纳奖励讲义中夹杂箴铭乐府，称其“指事寓规，词意婉挚”；后期则指责为“沾沾于文艺之末，雕章琢句，专事浮华”。十几年间，乾隆帝对进呈讲义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进呈讲义后期，讲义已经无义可讲，群臣言辄得咎，大以为苦。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监察御史金相疏奏：进呈经史分翰詹与科道两班，每班各出一人呈进。翰詹人数较多，科道人数较少。科道进呈次数多于翰詹。奏请改变轮进办法，平均轮派。乾隆帝也意识到进呈讲义已经失去了意义，因此上谕 “进呈经史一事，朕初意欲博综古义，广采群言，且可因言观人，究悉诸臣学识之高下，心术之真伪。其有阑入时政于事理未当者，间加训饬。自举行以来，诸臣按日进奏，朕一一披览，所称洞达天人、发明道奥者，亦殊不概见。兹据金相所奏，则是以进书为烦苦。朕前亦闻有此论而不信，今金相既显为此言，是诸臣未必不各有此见。且已行之十余载，渐成故套，进呈经史着停止。所有积年留存诸折斟酌荟粹成编。”[36]持续十二年之久的进呈讲义至此划上了句号。

三、《御览经史讲义》的编纂

遵照乾隆十四年（1749）上谕，作为十二年进呈讲义的总结，由协办大学士蒋溥（1708—1761）牵头开始了进呈讲义汇编工作，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最终完成，书名《御览经史讲义》。《御览经史讲义》三十一卷，共收讲义716篇，按照经、史、性理等讲义内容排列。篇首是《诸臣进讲钦奉上谕》一卷15篇，然后是《周易》八卷225篇，《书经》六卷195篇，《诗经》五卷109篇，《春秋》一卷14篇，《礼记》四卷58篇，《周礼》二卷24篇（附《论》《孟》《孝经》四篇），“史”三卷55篇 “性理”一卷17篇。

《御览经史讲义》名义上虽是汇编，其实并非全集，是选编而且缺失非常严重。其“凡例”已经指出“奉旨纂辑，其中蹇浅之作

无所发明者，不复滥入”。据笔者统计，《御览经史讲义》见收讲义进呈者282人。有的进呈者并未见收入。如上述收到乾隆帝点名批评的黄明懿。但受到过乾隆帝特别重视的夏之蓉也不在其内，就显得非常奇怪。每个进呈者所收讲义多少不一，多者达十二三篇之多（如周祖荣、赵青黎等），少者只收一篇。

就笔者所见，首先卷首《诸臣进讲钦奉上谕》部分就有遗漏。“凡例”第一条说：“诸臣进讲内有敷陈中理、奉旨嘉勉者，亦有所论未当、蒙恩开示者，洋洋圣谟同符典诰，实足以昭示来兹。谨据诸臣所述，汇成一帙，登诸卷首，仍载原进讲义以著缘起。”因为进呈讲义后得到乾隆帝召见的毕竟很少，而且都有乾隆帝的圣谕，因此《御览经史讲义》专设一章，有录必收，总计是15篇。事关乾隆帝御批，似乎不应有所遗漏。但细检《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一年（1751）六月甲申，给事中周祖荣奏进讲义《易经》“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一节，乾隆帝阅后召入陈对，实录全文记载了当时的上谕。[37]《御览经史讲义》卷二收录了周祖荣的这篇讲义，但有关圣谕并未收入。

其次，体裁距离讲义规定过远的没有收录。虽然《凡例》说“颂、赞、箴、铭及四言诗歌，原本经训，诸臣所进，间涉斯体，录存雅饬之篇。”并且表示“即或不涉训诂，而词条雅赡，可资观览，亦所不遗。”似乎有关诗赋也得以尽数收录，其实并非如此。上述程盛修所进并得到乾隆帝奖励的《咏史乐府十二章》就不见收录。[38]

再者，乾隆帝阅后转交大学士或部院议处的讲义大多失载。《清高宗实录》及《乾隆朝上谕档》提到的讲义有二十五篇，《御览经史讲义》所载不过五篇，不到五分之一。参见下表。

就清人文集所收讲义与《御览经史讲义》所收对照来看，《御览经史讲义》也有不少遗漏。如杭世骏（1695—1772）《道古堂文集》收讲义4篇，《御览经史讲义》只收1篇（另有一篇不见于文集）；蔡新（1707—1799）《缉斋文集》收讲义10篇，《御览经史讲义》只收5篇；任启运（1670—1744）《清芬楼遗稿》收讲义6篇，《御览经史讲义》只收5篇（另有一篇不见于文集）；陶正靖（1682—1745）《晚闻存稿》收讲义7篇，《御览经史讲义》只收录3篇；夏之蓉《半舫斋古文》收录讲义2篇，全然不见于《御览经史讲义》；彭启丰（1701—1784）《芝庭文稿》收录讲义3篇，《御览经史讲义》只收入2篇（另有一篇不见于文集）；齐召南（1703—1768）《宝纶堂文钞》收讲义10篇，《御览经史讲义》只收录了7篇（另有一篇不见于文集）。当然，《御览经史讲义》所收也有多于文集所收的状况，如《御览经史讲义》收录陈兆仑（1700—1771）讲义5篇，其中有2篇不见于《紫竹山房文集》。

《清高宗实录》《乾隆朝上谕档》所见讲义与《御览经史讲义》所载对照表

	乾隆朝上谕档》、《清高宗实录》所见	《御览经史讲义》所收
1	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编修彭树葵奏进经史	卷28，页1156上—1157下
2	四年二月十二日，程盛修进咏史乐府十二章	不载
3	四年三月初十日，李锦进呈经史	不载
4	四年四月初九日，检讨张鹏翀录进经史讲义	卷21，页219上—221上
5	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修撰金德瑛进经史讲义	不载
6	四年四月，叶一栋进呈经史	不载
7	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李锦进呈经史	不载
8	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王兴吾进呈经史	不载
9	四年十二月?，徐以升进呈经史	不载
10	四年十二月，张鹏翀进呈经史	不载
11	五年三月十八日，编修林枝春进呈经史	卷14，页712下—714下
12	五年闰六月二十七日，张鹏翀进呈经史	不载
13	五年七月十一日，于振进呈经史	不载
14	五年七月，给事中朱凤英进讲折	不载
15	五年九月十三日，夏之蓉进呈经史	不载
16	五年十月，秦蕙田进呈经史	不载
17	七年十二月三日，周长发进呈《礼记》讲章	不载
18	八年四月辛卯，御史徐以升进呈经史	不载
19	八年五月初三日，沈懋华进呈经史讲义	不能确指
20	九年八月丁未，编修杨开鼎进呈经史	不载
21	九年九月乙亥，编修黄明懿进呈讲章	不载
22	十一年六月甲申，给事中周祖荣奏进经史	卷2，页168。圣谕失载
23	十一年九月庚戌，编修杨述曾进呈经史	不载
24	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检讨程恂进呈讲义	不载
25	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御史冯秉仁进讲	不载

四、后世关于进呈讲义的争论

乾隆初期十二年之久的进呈讲义活动，以《御览经史讲义》的汇集告一段落，但有关进呈讲义的争议并没有结束。

嘉庆十四年（1809），御史张鹏展奏请仿效乾隆初政，令翰林科道日进经义，被嘉庆帝斥为迂腐。[39]嘉庆二十四年（1819），御史唐鉴（1778—1861）奏请恢复康熙时期的轮班日讲、乾隆时期的缮进经史讲义，结果也遭到了嘉庆帝的拒绝。嘉庆帝理由是：翰詹科道资历太浅，所撰讲义理论水平、政治水平都不高，不能阐发经典奥义，大多是“摭拾陈言，敷衍入告”，或以“颂扬塞责，甚至妄议时事”。即使其建议有一定道理，但是否能够付诸实践也是问题。而且讲义完全可以由人捉刀代笔，并不能真正体现其学识水平。结论是恢复进呈讲义只是“博稽古之名，而无裨实政”。[40]

道光初年，陈鸿（1780—1833）建言恢复轮班日讲。陈鸿认为康熙、乾隆间“设官使日缮进经史讲义，讨论益精，义理愈出，辨别益确，施措益明，兼可鉴其才猷，验其学识。既备咨访之具，即储简拔之才。”[41]似乎并没有得到任何回音。道光六年（1826）魏源（1794—1857）主编《清经世文编》，卷十治体政本部分选录乾隆时期进呈讲义28篇。说明在魏源看来这些讲义还是非常具有经世实用意义的。

道光三十年（1850），礼部侍郎曾国藩（1811—1872）奏请恢复康熙日讲，并且草拟了详细的日讲规则，得到了咸丰帝的支持，却遭到了执政大臣的反对。最后，咸丰帝采取折中态度，一度恢复了进呈经史讲义。[42]咸丰帝初年的进呈讲义基本上是照搬乾隆样式，目的在于“可以古为鉴，且以观诸臣器识学问，为量能授任之资”，重点似乎仍在后者。与乾隆朝不同的是，进呈者只限翰林院和詹事府，没有了六科十三道。进呈讲义的题目是由咸丰帝钦定，不再是进呈者自由选取。据《蕉廊脞录》记载“行之期年，后以东南兵事日棘，宵旰忧劳，遂辍讲。”[43]因为太平军兴，咸丰初年的进呈经史只持续了一年时间。

进入光绪（1874—1908）后，经筵、日讲、进呈讲义三种帝王教育形式都已经绝迹（光绪末年一度恢复日讲）。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陈澹然（1859—1930）发表了他对帝王政学的看法。陈澹然认为“帝王之道莫大乎集天下之才以为才，莫捷于集群臣之学以为学”。培育圣学的方法唯有经筵，但经筵礼数太过繁琐。“要在行其义而不必拘其节，乃可持行永久，而上下无劳。”因此，陈澹然认为乾隆朝进呈讲义是最为理想的形式。“命翰詹科道诸臣日呈经史讲义，其善者或阐发精义，或因事效忠。无不俯霁天颜，立蒙褒予。即或义有未当，论有未明，亦必训示周详，籍资启沃。此诚赞翼圣智之大端也。”同时，陈澹然认为乾隆时期进呈讲义的模式不尽完善，建议加以改进。“科道即居言责，似毋庸责以进呈。而翰詹地处清华，旷无职守，课之讲义，若名师之教生徒，必能下砺贤才，上俾圣哲。拟请明谕翰詹诸臣，日以经、史、舆图、时政诸书为课，自呈掌院，注明现读之书，人撰一义。由掌院日呈讲义五篇，周循无间。”[44]如此就可以“无经筵之劳，坐收经筵之益。一举数善，莫捷于斯。”

宣统元年（1909）二月，监国委任讲官十余人分日进讲。进讲内容分为八门，偏重西学。进讲并没有施行多长时间，后逐渐废弛，改为按期进呈讲章。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上谕“昨日吴士鉴所进《西洋通史讲义》尚属可观。嗣后进讲诸臣，务当于各书中有关一切新政宪法之处，详慎采择，剀切敷陈，俾有益于朕殷殷求治变法之至意，断不可摭拾空言谬论，无补时艰为要。”[45]由此可见，清代进呈讲义内容已经随时代的变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惜这是清朝关于进呈讲义的最后记载。

五、结论

综上所述，乾隆二年（1737）至十四年（1749）的进呈讲义活动以失败告终。后世诸帝有仿效也有排斥，对进呈讲义的得失议论不一。单就乾隆朝进呈讲义而言，开展伊始目的就不统一，群臣意在教育帝王，乾隆帝意在考鉴群臣。双方的目的似乎都没有实现。

群臣意图通过进呈讲义实现其教育帝王、致君尧舜的目的，但却得不到乾隆帝的认可，自然会以失败告终。乾隆五年（1740），给事中朱凤英不满足以进呈讲义的形式代替日讲，希望正式恢复康熙时期的日讲。其在进呈讲义中声称 “圣祖仁皇帝时，廷臣按值分班趋侍讲幄。请敕谕馆阁覆查康熙年间儒臣进讲班值典礼详议，请旨酌定施行。”得到的回复是：康熙朝与乾隆朝状况不同，乾隆帝圣学业已大成，不再需要特殊的经筵帝王教育。所谓：“当圣祖仁皇帝，冲龄御极，亲政初年，经籍史编自句读训诂之间，进而深于义理之蕴，所资于讲肄者甚切……我皇上绍登宸极，圣学业已大成。临御以来，涵茹经史，典学缉熙，孜孜罔倦，则所谓逊志时敏者，乃在敷政宁人之实，而非徒口耳之勤，且在躬行心得之要，而不在仪文之节，举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设诚而致行之，综揽万机无在而非讲学也。”㊻受教育者既然自以为身兼君师、治统道统兼得，没有再接受教育的必要，进呈讲义这种帝王教育形式自然也难以有什么成效。

乾隆帝意图通过进呈讲义“因言观人，究悉诸臣学识之高下，心术之真伪”，俨然把进呈讲义当成了科举考试的延续，颠倒了传统的师生传授关系，无形中给讲义进呈者增添了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乾隆帝性情多变，喜好捉摸不定，一时理学一时经学，进呈者皆以为苦不堪言。这也就注定了乾隆时期进呈讲义必然要以失败告终。

---

①杨士奇等编 《历代名臣奏议》，卷七 《苏颂奏疏》，页 94-95，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②李焘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七，宋哲宗元佑二年十一月壬申，页 3850，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三，宋哲宗元佑四年三月壬申，页 3988。

④苗书梅点校 《宋会要辑稿·崇儒》，卷七 《经筵》，页 384，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⑤周永春辑 《丝纶录》，卷二，页 640， 《四库禁毁书丛刊》 史部 074 册，北京出版社 1997 年。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 《康熙起居注》，页 1471-1472，中华书局 1984 年。

⑦贺长龄辑 《清经世文编》，卷九 《请缮进经史以资圣治疏》，页 22-23，中华书局 1992 年。

⑧ 《清高宗实录》，卷三九，乾隆二年三月戊申，中华书局 1985 年。

⑨乾隆敕编 《御览经史讲义》，卷一，页 1，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吉林出版集团 2005 年。

⑩ 《清高宗实录》卷三九，乾隆二年三月甲寅。

⑪赵之恒标点 《高宗圣训》，卷一三，页 1320， 《大清十朝圣训》，燕山出版社 1998 年。

⑫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乾隆朝上谕档》，第 1 册，页 378，档案出版社 1991 年。

⑬ 《御览经史讲义》，卷二一，页 219 上-221 上。

⑭⑮⑯⑰⑱⑲ 《乾隆朝上谕档》，第 1 册，页 398；页 423；页 494；页 494-495；页 498；页 500-501。

⑳夏之蓉 《半舫斋古文》，卷四 《进书札子一》，页 52-53， 《四库未收书辑刊》 集部第 9 辑 26 册，北京出版社 1998 年。

㉑㉒㉔ 《乾隆朝上谕档》，第 1 册，页 636；页 649；页 439。

㉓ 《清高宗实录》，卷一八八，乾隆八年四月辛卯。

㉕ 《御览经史讲义》，卷三，页 222 下-224 上。

㉖ 《乾隆朝上谕档》，第 1 册，页 313。彭树葵所进讲义见 《御览经世讲义》 卷二八，页 1156 上-1157 下。

㉗㉘ 《乾隆朝上谕档》，第 1 册，页 353；页 648。

㉙ 《御览经史讲义》，卷一，页 77 下-78 上。

㉚ 《御览经史讲义》，卷一，页 100 上下。

㉛ 《清高宗实录》，卷一八五，乾隆八年二月乙巳。

㉜ 《清高宗实录》，卷二二二，乾隆九年八月丁未。

㉝ 《乾隆朝上谕档》，第 1 册，页 822。

㉞ 《清高宗实录》，卷二二四，乾隆九年九月乙亥。

㉟㊱ 《乾隆朝上谕档》，第 2 册，页 139；页 283。

㊲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九，乾隆十一年六月甲申。

㊳ 《咏史乐府十二章》，收于徐世昌编 《清诗汇》。

㊴ 《清会典事例》，卷一〇四七，中华书局 1991 年。

㊵ 《清仁宗实录》，卷三五三，嘉庆二十四年正月癸丑，中华书局 1986 年。

㊶震钧 《天咫偶闻》，卷一，页 33-34，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 22 辑，文海出版社 1966 年。

㊷ 《清会典事例》，卷一〇四七，页 492-493。

㊸吴庆坻 《蕉廊脞录》，卷一 《咸同日讲故事》，中华书局 1990 年。

㊹陈澹然 《寤言》，卷二 《拟陈政本疏》，光绪二八年刻本。

㊺ 《宣统政纪》，卷九，宣统二年闰二月辛巳，中华书局 1987 年。

㊻ 《乾隆朝上谕档》，第 1 册，页 635。